

近代中日思想
文化交涉史研究



百年南开
日本研究文库

近代中日思想 文化交涉史研究

刘岳兵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近代中日思想文化交涉史研究 / 刘岳兵著.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9. 7(2020. 4 重印)

(百年南开日本研究文库)

ISBN 978-7-214-23284-7

I. ①近… II. ①刘… III. ①中日关系—文化交流—
文化史—研究—近代 IV. ①K250.3②K31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043117 号

书 名 近代中日思想文化交涉史研究

著 者	刘岳兵
特 约 编 辑	康海源
责 任 编 辑	史雪莲
装 帧 设 计	刘葶葶
责 任 监 制	陈晓明
出 版 发 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pph.com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52 毫米×960 毫米 1/16
印 张	35.25 插页 4
字 数	464 千字
版 次	2019 年 8 月第 1 版 2020 年 4 月第 2 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214-23284-7
定 价	124.00 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百年南开日本研究文库”

编辑委员会

主 编：刘岳兵

副主编：杨栋梁 李 卓 宋志勇

委 员：俞辛焯 米庆余 王振锁

杨栋梁 李 卓 赵德宇

莽景石 宋志勇 刘岳兵

“百年南开日本研究文库”出版说明

2019年南开大学建校百年校庆，作为中国教育史上的大事，当然是值得纪念的。

如何使纪念百年南开的活动具有历史意义？我们很早就开始谋划和筹备。早在2015年春节期间，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原院长、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主任杨栋梁教授，向江苏人民出版社王保顶副总编提起，想以集体展示日本研究院研究成果的形式来纪念南开百年校庆。这一提议得到了保顶同志的大力支持，也得到了研究院各位同事的积极响应。后来经过商讨，编委会一致同意以“百年南开日本研究文库”作为南开日本研究者纪念百年校庆丛书的名称，本文库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和南开大学出版社分别出版。与百年校庆相适应，“百年南开日本研究文库”也应该是百年来南开日本研究业绩的展现。为此，编委会确定本文库由以下几个方面的成果构成。

第一，从南开大学创立到抗日战争胜利时期南开的日本研究成果。刘岳兵教授搜集相关文稿四十余万字，编成了《南开日本研究（1919—1945）》。这是一本专题性的南开大学校史资料集，对于研究和总结包括南开大学在内的这一时段中国日本研究的状况和特点，具有重要的史料

价值。

第二,新中国建立以来,南开大学成立的实体日本研究机构研究者的成果。实体研究机构包括1964年成立的日本史研究室、2000年实体化的日本研究中心和2003年成立的日本研究院。

第三,1988年组建的南开大学日本研究中心,是以日本史研究室成员为核心,联合校内其他系所相关日本研究者成立的综合研究日本历史、经济、社会、文化、哲学、语言、文学的学术机构。在百年南开日本研究的历史发展中,日本研究中心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库也包括该中心成员的成果。

今后,如果条件成熟,还可以将日本研究院的客座教授和毕业生的优秀成果也纳入这个文库中,希望将本文库建设成为一个开放的、能够充分且全面反映南开日本研究水平的成果展示平台。

在中国百年来的日本研究中,南开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历史的发展和南开的先贤告示我们:日本研究对于中国的发展至关重要。中日关系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其经验教训值得认真总结。百年来,南开大学的日本研究者孜孜以求,探寻日本及中日关系的真相,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吴廷璆先生主编的《日本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年),是南开大学与辽宁大学两校日本研究者倾注近20年心血合力打造出来的。杨栋梁教授主编的十卷本“日本现代化历程研究丛书”(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及六卷本《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观》(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也几乎是倾日本研究院全院之力而得到了学界认可的标志性研究成果。另外,在日本国际交流基金的资助下,南开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从1995年开始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南开日本研究丛书”,展现了中心成员在日本研究各具体专题上的业绩,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这些成果都是南开日本研究者集体智慧的结晶。

“百年南开日本研究文库”是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和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相关学术成果的集体展示。我们相信,本文库将成为

南开大学日本研究和南开大学世界史学科“双一流”建设的又一项标志性成果,她将承载南开精神、贯穿南开日本研究学脉,承前启后,为客观地了解日本、促进中日关系健康发展做出新的贡献;我们也想以此为实现“发展同各国的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交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想,培养全民族的国际视野和情怀,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世界历史知识和认识水平,尽我们的一份绵薄之力。

“百年南开日本研究文库”编辑委员会

2019年3月19日

代绪论 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一种粗线条的学术史漫谈

中日文化交流史这一研究领域,是中日关系史的一个分支,既属于日本史学科范围,也属于中国史学科范围。可能正是因为它横跨两个学科,而且文化交流的内容广泛而庞杂,在进行学科综述或学术史整理时,往往没有作为一个独立的课题来总结。虽然专门的中国史研究者,未必都涉足中日关系史研究领域,但是许多日本史研究者,在不同的时期,或者研究到一定的程度,往往会关心或直接研究中日关系史中的相关问题。中日关系中,文化交流关系可以说是最持久、最频繁的关系,其对日本史的形成与发展,无论是古代还是近现代,影响也最深,因此,日本史研究者关注中日文化交流史是一种顺理成章的事。这方面的研究情况也往往被直接放到相应的断代史和日本哲学、思想、文化、神道、佛教等专题研究的综述中去总结了。^①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随着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的大势所趋,中国的日本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在1982年,北京的三联书店和人民出版社分别出版了中国日本史研究会编的《日本史论文集》(共收入24篇论文,

^① 参见李薇主编的《当代中国的日本研究(1981—201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

其中有5篇是论述中日关系的)和北京市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会^①编的《中日文化交流史论文集》,可以说是这方面的研究者在新时期的首次集体亮相。十年之后,全国的日本研究者举集体之力,推出了两本工具书,即《日本史辞典》(吴杰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和《中日文化交流事典》(刘德有、马兴国主编,辽宁教育出版社),可以说研究工作在这两个紧密相关又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是齐头并进的。虽然在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领域,通史性的著作不如日本史方面业绩突出,但在中日文化交流涉及的相关方面所取得的研究成果不容忽视,影响也非常巨大,值得认真总结。这里,鄙人不揣简陋,愿就手头现有资料,做一种粗线条的学术史整理。

(一) 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的概念与方法

中日文化交流史又称中日文化关系史,周一良先生有一本《中日文化关系史论》(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书名虽然叫作“中日文化关系史”,但其中所收篇目也有以中日“文化交流”或“文化交流史”为题的。其“前言”开宗明义,指出“《中日文化关系史论》这本书主要是关于中、日两国之间的历史、文化、政治关系的考察和研究”。交流与关系两个概念虽然有不同之处,但是正如刘德有所言:“中日关系史,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部中日文化交流史。”^②无论如何,“文化”“交流”“关系”是该研究领域三个最基本的概念。

先来看看“文化”这个概念。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化热”已经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成为当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课题,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的

① 北京市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会成立于1980年,首任会长为周一良,详细情况参见王晓秋《北京市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会的三十年》,收入徐勇、王晓秋主编:《中日文化交流两千年:回顾与展望》(北京市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会成立3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虽然没有全国性的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会或学会,但是有成立于1984年的“中国中日关系史研究会”,首任会长为赵朴初。此外有中华日本学会、中国日本史学会、中华日本哲学学会等全国性学会,其会员多有从事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

② 刘德有:《序》,滕军等编著:《中日文化交流史:考察与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页。

活跃当然也受到该热潮的影响。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者对“文化”这个概念也有一些思考。如周一良将文化分为狭义的文化、广义的文化和深义的文化三个层次,认为“文化应当包括一个民族通过长期体力和脑力劳动所取得的物质的、精神的全部成就”的同时,指出与这种广义的文化相对,“一般说起文化,就想到哲学、文学、美术、音乐以至宗教等主要与精神文明有关的东西,这可以说是与政治、经济相对而言的狭义的文化。”所谓“深义的文化”,他认为就是“在狭义文化的某几个不同领域,或者在狭义和广义文化的某些互不相干的领域中,进一步综合、概括、集中、提炼、抽象、升华,得出一种较普遍地存在于这许多领域中的共同东西。这种东西可以称为深义的文化,亦即一个民族文化中最为本质或最具有特征的东西。”他用“民族性”这个概念来说明深义的文化特征。他说:“对于一个民族,只了解其政治经济制度当然不够,还要通晓其历史语言,但更重要的,还要了解其文化——不仅狭义、广义的文化,而且要了解深义的文化,亦即一个民族的灵魂深处。研究一个历史时代也是如此。政治事件、经济制度以外,如果对文化一无所知,或者只是具备狭义以至广义的文化方面的知识,而不能从深义上有所了解,亦即不了解这一历史时期的文化特征和精神风貌,这种历史知识也是不完整的。”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虽然范围可以很广泛,但是不同层次之间的交流也有不同的特征。周一良概括为:“狭义和广义的文化可以相互学习、引进,在对方国家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而深义的文化,由于是长时期在特定的自然的、历史的和社会的条件下所形成,成为民族精神的结晶,几乎近乎民族性的东西,尽管也可以相互交流学习,加深理解,作为参考,(中略)但又不像狭义和广义的文化那样容易移植引进,拿过来化为我有。”^①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赵建民在《概论中日文化关系及其思考》中,对

① 周一良:《我对中外文化交流史的几点看法》(1986年),收入《中日文化关系史论》,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7、18、20页。

“文化”这个概念给出了他自己的定义,即:“文化是由人创造的,它是人们生活的种种表现和记录。所谓‘表现’,即是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价值判断、心理素质等方面;所谓‘记录’,即指自古以来各种学派、教派等创造的各种成分的文化共同体,如日本的神道、中国的阴阳五行学说、中日共有的儒学、佛教等。并将‘表现’称作文化传统,‘记录’称作传统文化。”进而论述说:“传统文化,指具体的存在物,纯属历史范畴,是历史的‘物化’;文化传统,指以往融入人们心血的客观存在,是历史的‘人化’。说得再具体些,所谓‘传统文化’是指外在于人心的一些客观的东西,如器物、典章、制度等,它们是作为一种客体与人相应;所谓‘文化传统’是指一种内在于人心的东西,如人的精神、心态等。”^①关于中日文化关系,他认为是既有亲密性,日本文化又有其独创性,从文化传统而言,是同源而异质的关系,强调“对其异质性要予以充分的重视”。只有充分认识到这种不同民族性格形成的历史过程,在相互交往中,彼此扬长避短、取长补短,才能加深相互的理解,增进彼此的友谊。^②

再来看“交流”这个概念。首先,如周一良所言,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是历史的必然。而且文化的交流总是相互的,有来有往。他特别注意到这种相互性,“并不是说甲国与乙国,或甲时期与乙时期,都不问时间地点,双方对等地相互交流,而是综观历史长河,在总的收支中,总的时空范围中,中外文化交流是有来有往的。”^③除了交流的双向性外,还有一个选择性的问题。《唐代中日文化交流中的选择问题》开篇,周一良就这样论述:“凡是两个国家或两个民族进行文化交流,在接受的一方必然既有交流的需要,又有适宜的条件和环境,然后交流的成果才能在一时间里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如果接受的一方条件改变,失去土壤,交

① 见赵建民:《晴雨耕耘录——日本和东亚研究交流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4页。

② 同上,参见第15—16页。

③ 周一良:《谈中外文化交流史》(1987年),收入《中日文化关系史论》,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页。

流的需要不复存在,则原有交流成果也必然不能长久存在下去。中国与日本之间的文化交流,也不例外。”^①而这种选择的趋向,“是在社会发展阶段上处于先进的一方,常常吸引后进的一方去向它学习。”或者说“经济文化先进的国家吸引并影响后进的国家”。^②交流的途径或形式,有政府派遣的官方使节、学生的往来、宗教交流、商业与商人的交流、手工业的往来、战争以及随之而来的俘虏和战利品等,这些不仅限于中日两国之间,世界各地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也同样是这些途径与形式。交流过程中产生的“文化冲突”或“认同”、交流的“输出”与“逆输出”形式,以及“文化孳乳”与“文化反哺”“反噬”的现象也都是文化交流史的研究课题。

“关系”是一个外延很宽泛的概念。如果一定要仔细比较并区分“中日文化交流史”和“中日文化关系史”这两个研究领域,还是能够看出一些各自的特点。“交流”,给人的动态感更强一些,如交际、流动、流布、移植、影响等。而“关系”,可以是动态的——交流本身也是一种关系,也可以是静态的;可以包括如“交流”那样以共时性为出发点的相互或互动关系,也可以包括通过历时性的比较而得出的有意义的相应关系。而这种相应关系虽然不一定是本然的史实性的“历史关系”,但其作为研究者所挖掘出来而带有主体创造性的“逻辑关系”,也可以视为广义的“交流史”的研究对象。“关系研究”与“比较研究”常常是紧密联系的,“比较研究”只要可比性论证得充分,其创造性的逻辑关系具有真理性,它就很可能成为一种新的史实,作为历史研究者参与历史创造的见证。交流史的视野与深度如果因此得到拓展,这样的比较研究成果是完全配享“文化

① 同上,《中日文化关系史论》,第33页。

② 同上,《中日文化关系史论》,第5页。

交流”的名义的。^①

严绍璦从比较文学、比较文化研究的视角来探讨中日关系与交流史,其力图从理论与方法上有所创新的努力,是值得关注的。从提出“如果从发生学的立场来考察,那么,可以说,日本古代文学是一种‘复合形态的变异体文学’”^②这一论断,到将“发生学”提升成为一种比较文学研究的基本观念,指出“‘影响研究’和‘关系研究’的本质,正在于从‘文本’的立场上探索文学的成因。因此,当我们把‘文学的发生学’作为比较文学的一个新的研究范畴提出来时,事实上,我们是把传统的‘影响研究’的学术做到了能接近于它的终极目标的层面上了”,^③这是一次理论的升华。“发生学”与“变异体”概念是严绍璦研究中日比较文学、比较文化的理论结晶,他强调其发生学作为“一个解释文学内在生成机制的逻辑系统”,是以“‘原典实证’构成学术观念和方法论”,并且“一切以‘可以确证的原典文本’为依据,阐述‘文本’之所以成为‘这样的文本’的一系列以‘文化语境’为‘生成场’中多元文化连接的逻辑过程。”^④这种观念与方法,对于中日文化交流史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到21世纪之后,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领域在方法论上还有一个常常见到的新概念,那就是所谓“他者认识”。“他者认识”是中国人在日本组织的最大的学术团体“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会”2003年举行的第15届年度研讨大会的主题,其成果《中国与日本的他者认识——中日学者的共同探讨》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在2004年出版。李晓东在《卷首语》中提出,中日之间“为什么双方的往来愈是加深,双方的关系却如同两个日

① 北京大学比较文学博士、北京语言大学教授周阅2013年在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其新著《比较文学视野中的中日文化交流》(张辉、宋炳辉主编“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术文库”的一种),该书书名、版权页与封面皆为上述“比较文学视野中的中日文化交流”,而书脊和扉页上标的书名则是“比较文学视野中的中日文学与文化”,没有将“交流”与“比较”并举。这种“疏忽”,或许正体现了著者或主编对是否应该将这两个概念并举的犹豫。

② 严绍璦:《古代中日文学关系史稿·前言》,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

③ 严绍璦:《关于文学“变异体”与发生学的思考》(《中国比较文学》2000年秋季号),见严绍璦著:《比较文学与文化“变异体”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68—69页。

④ 严绍璦:《比较文学与文化“变异体”研究》,第69页注释①。

益增大的相斥的磁场那样日益疏远呢?”为此,他谈到选题的缘由,说:“正是出于对两国间的异质性的关注,我们选定了‘他者’这样一种视角”,同时对“他者”进行了如下解释,即“他者(Others),这个最早作为文化人类学上的术语现在已在各研究领域得到广泛的运用。在讨论中日关系时,这一视角同样有助于促使人们更多地意识到两国间存在着的许多本质上的差异。(中略)这里的他者并不意味着对于中国来说的日本,或对于日本来说的中国,而是包含了中日两国以外的第三者和更多的他者,通过这种多元的视角,他者就像一面面镜子照出更为立体、多面的自我与对方,必然有助于中日双方的相互了解与理解。”^①这种“他者认识”的视角在中国研究领域,以葛兆光主持的“从周边看中国”的项目最具代表性。“从周边看中国”就是要“借助前后左右多面镜子映照,才能够看清中国的立体形象和细部特征。”^②对收集在《从周边看中国》论文集中他的论文《揽镜自照》这个题目的意思,他解释说,“用现在时髦的话来说就是‘通过他者认识自我’,这是文化反思的一般途径,如果没有一个有差异的‘他者’,也就无法借助差异来认识‘自我’。”在文章的结尾提到:“在很长的时间里,东方诸国尤其是朝鲜人、日本人和中国人曾经共享过一个来自汉、唐的历史、传统与文化,但是,丰臣秀吉侵朝以及明清易代之后的彼此分道扬镳已经使得几个民族、文化和国家之间渐行渐远。正是这些渐渐发生并滋长的文化差异,促成了彼此互相观看之际的感情变化、价值差异和视角分离,而这种感情变化、价值差异和视角分离,则使得各自通过对方看到了彼此细微却深刻的不同,透过原本一体的‘同’和看似细微的‘异’,也许更能使彼此看清各自文化,也体味到这些细微的文化差异,是如何经由历史和时间的放大,渐渐演变成当下这

① 李晓东:《卷首语》,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会编:《中国与日本的他者认识——中日学者的共同探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2、3页。

② 葛兆光:《序》,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编:《从周边看中国》,中华书局,2009年,第1页。

种深刻和难以弥合的文化鸿沟。”^①这一思路,对于我们研究日本、研究中日关系和中日文化交流,无疑大可借鉴。

“他者认识”或“他者意识”在日本研究领域,也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卞崇道在晚年的倡导,本人曾详细论及,^②此处不再重复。而吴光辉最近出版的《他者之眼与文化交涉——现代日本知识分子眼中的中国形象》一书,如作者所言,其研究的目的“并不仅仅在于指出中国形象是什么,中国形象究竟如何,更为重要的是要探讨这样的中国形象之背后,究竟隐藏了什么样的日本式的思维模式,或者处在了什么样的话语权力之下的问题。也就是说,这一研究的真正对象与其说是中国,倒不如说是日本。”^③是从“文化交涉学”的立场对中日关系的有益探索。

中国人研究日本文化,要重视同中求异,重视寻求日本“固有精神之所在”,周作人早在六十多年前就有过这样深刻的反省。他说:“如只于异中求同,而不去同中求异,只是主观的而不去客观的考察,要想了解一民族的文化,这恐怕至少是徒劳的事。我们如看日本文化,因为政治情状、家族制度、社会习俗、文字技术之传统,儒释思想之交流等,取其大同者为其东亚性,这里便有一大谬误,盖上所云云实只是东洋之公产,已为好些民族所共有,在西洋看来自是最可注目的事项,若东亚人特别是日华朝鲜安南缅甸各国相互研究,则最初便应罗列此诸事项束之高阁,再于大同之中求其小异,或至得其大异者,这才算能了解得一分,而其了解也始能比西洋人更进一层,乃为可贵耳。我们前者观察日本文化,往往取其与自己近似者加以鉴赏,不知特此为日本文化中东洋共有之成分,本非其固有精神之所在,今因其与自己近似,易于理解而遂取之,以为已

① 葛兆光:《揽镜自照——关于朝鲜、日本文献中的近世中国史料及其他》,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编:《从周边看中国》,第483页。

② 参见《中国日本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一种学术史的回顾与展望》(莽景石主编:《南开日本研究2012》,世界知识出版社2013年)、《未名庐学记:卞崇道及其日本哲学思想研究管窥》(《日本问题研究》2013年第3期)。

③ 吴光辉:《他者之眼与文化交涉——现代日本知识分子眼中的中国形象》,厦门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47页。

了解得日本文化之要点,此正是极大幻觉,最易自误而误人者也。”甚至强调:“应当于日本文化中忽略其东洋民族共有之同,而寻求其日本民族所独有之异,特别以中国民族所无或少有者为准。”^①这里的“得其大异者”,与“如果就中日间实际存在着的异同来说,双方之间不仅存在着‘大同’,同时也存在着‘大异’。如果我们小看、轻视了两国间的‘大异’,就不可能实现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大同’。”^②有异曲同工之妙,虽然不知后者“真正意义上的‘大同’”所指何谓;而葛兆光谈到的“当我们谈论‘中国’和‘西方’文化的时候,常常会不自觉地突显彼此的‘异’,可是,当我们在谈论‘中国’和‘东方’的时候,却总是在强调我们的‘同’”这种“很奇怪”的现象,^③周作人也早就看到了,并且指出“东洋之公产”,“在西洋看来自是最可注目的事项,若东亚人特别是日华朝鲜安南缅甸各国相互研究,则最初便应罗列此诸事项束之高阁”,只有“在同中求异,或至得其大异者”,东亚人的相互了解才能“比西洋人更进一层”。

然而如坂本太郎所言,“无论史论多么绚丽,时代一变就会褪色。而作为根本史料的史书能保持不朽的生命。”^④概念和方法,作为史论,虽然重要,但是如没有坚实的史料基础作支撑,也容易流于空论。

(二) 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的现状与课题

在八十年代末就有人概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九个方面的主要内容,^⑤新世纪以来,研究的领域越来越宽,课

① 周作人:《日本之再认识》(1940年12月17日),钟叔河编:《周作人文类编》⑦日本管窥,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92—93页。

② 李晓东:《卷首语》,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会编:《中国与日本的他者认识——中日学者的共同探讨》,第2页。

③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编:《从周边看中国》,第483页。

④ 坂本太郎:《史書を読む》,中央公论社,1987年“中公文库版”,第228页;见《修史と史学》(坂本太郎著作集第五卷),吉川弘文馆,1989年,第448页。

⑤ 叶昌纲:《建国以来我国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述评》,《山西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这九个方面是:综合性研究、科技交流史、文学艺术交流史、语言文字交流史、佛教交流史、儒学交流史、革命运动与维新思想的研究、留学生问题研究、有关书籍的研究。

题有增无减。比如经济、法律文化、民俗岁时、教育、文学艺术中的音乐、戏剧各门类等,不胜枚举。李玉的《中国的中日关系史研究——以中日关系史研究论著数量统计为中心》^①为我们认识这一课题的学术史研究状况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历史上的日本记述、研究著作都可以归入中日关系史领域,现在的日本研究著作将来也亦可作如是观。特别是随着中日之间各种交流渠道越来越广泛,往来愈加频繁,日本研究著作本身几乎可以说就是各自交流的产物。这里对研究现状与课题的归纳不可能是全面的概述,只能是囿于一己之见的粗线条整理,挂一漏万在所难免。

1. 民国时期的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及其在新中国的影响

民国时期的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状况,可以以1931年和1945年为界划为三个阶段,其中中日十五年战争期间的研究成果最多,与战争相关的内容也最密切。从研究者的立场来看,也非常复杂,有知日派、亲日派甚至投日派、抗日派之别。九一八事变之前,1930年1月创刊的《日本研究》,其《卷头语》中说:

中日两国间在历史上,在地理上,在外交上有如此深长而密切的关系,而日本对于我国内容知道得又如此周详细致,那我们岂可对于他们因为厌恶的心理而不加以注意?还有,日本以一个贫薄的岛国,经六七十年的苦斗,居然能在国际上和列强分庭抗礼,这一点也就很不可小觑。

实在我们早就应该对他们为很周详细致的研究,正如他们研究我们一样;现在已经是迟了,但是愈迟,愈得赶快去做;所以同人不自量力的下一个决心,从现在起一期一期像照相般把日本古今实在的状况贡献于国人眼前!我们采取最严正不偏的态度,纯粹客观的方法;没有别种作用,也不是宣传;总之使我们知道日本的内容,知

^① 李玉、夏应元、汤重南主编:《中国的中日关系史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第一编总论第二章。